

# 论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的困境及出路

——从王诺生态批评谈起

李忠超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当今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之所以面临困境,原因在于把西方生态学关于人类主体对自然界过度改造而导致的恶果反思,当作了审美活动批评的标准,以生态学僭越美学,造成了人为的自然生态审美与人的对立。“科学—工具”主义造成的生态危机,促使人们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批判,诉求生态系统和谐发展。人作为主体参与到审美活动,这种主体性参与是审美活动中无法取消的底线。坚持自然生态审美的自然性、生态性,不能彻底排斥人的主体性参与。因此,克服生态批评的困境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人的主体性在生态审美中的重要性,在理论迁移时注意中西美学分属于不同的“时空”语境,如此才能在具体生态批评实践中避免“强制阐释”,同样也是生态美学未来的出路。

**关键词:**生态美学;生态批评;主客二元;主体性;中国美学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39(2020)04-0061-07

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是把场域之外的生态学引入到美学研究领域,场域之外的生态学是按照西方科学主义认识论建构起来的学科,属于自然科学范畴,自然科学研究的逻辑不能直接应用于人文科学研究,因为在方法论上两者有根本区别。西方哲学认识论在唯心与唯物上的分野和对立,在美学领域表现为对美的本质认识主客二元论。中国美学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自然是相和的,天人合一;而西方传统美学主要关注的是美学的形式,试图以一种统一的规律性“范式”来总结出“美本身”。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西方美学是一种“区分型”美学,而中国美学是一种“关联型”美学,因此生态美学在中西美学拥有两种不同表现形态<sup>[1]61</sup>。西方哲学认识论、生态危机、科学主义以及工具理性带来的反思等促使西方生态学的发生,但中国美学尤其是古典美学认为人与自然关系不是紧张对立的,也没有面临西方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如果用西方生态学直接套用到中国古典美学研究,就会显现出种种问题。

生态主义是一种系统性的知识,生态系统的的发展乃是为整体的发展,因此符合生态系统本身

目的就是好的,生态系统的功利性自然排除了一些非生态、非人为的因素。人们欣赏园林景观,实际上不是因为其具有生态价值,而是因为其形式、颜色、线条这些因素让人感觉到审美愉悦。并不是生态系统需要的价值就一定也是人类审美的价值需求。因此,生态美学以“生态+美学”的最大危机就在于把一个形式美学之外的科学主义的标准作为一种审美标准。而这种生态审美观主要就是以生态整体主义展现的。

## 一、生态美学思想的理论预设

生态批评肇始的时代背景是西方工业化危机对自然环境的戕害,过度滥用化学产品破坏生态而引发的全球反思。生态主义主要着力点是人与环境(生态)问题,但是这种人与环境(生态)的关系,却呈现出一种紧张对立状态,达到一种完全不相容的境地。王诺先生本人也关注到台湾淡江大学高柏园先生对完全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并张扬生态整体主义提出的质疑<sup>[2]19-27</sup>,努力尝试消解矛盾和冲突,但心有余却力难“尽”,未能尽善尽美。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生态美学思想本身就面临着生态中心与人类中心的争论,尽管王诺将路径投

收稿日期:2020-05-10

作者简介:李忠超(1989—),男,安徽临泉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向了生态整体主义,其论证和批评实践却依旧举步维艰。

第一,生态美学理论预设与实践的矛盾。王诺辨析了生态和环境的概念,指出生态主义背后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才是真正意义所在<sup>[3]</sup>。生态整体主义理论预设是把整个生态系统看作一个整体,从生态学的立场出发,强调自然生态的整体观,整个生物系统是生态整体的中心,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是最高最求。生态整体主义强调生物系统整体观。“有利于生态系统和谐稳定的才是美的,干扰破坏了生态整体和谐稳定的就是丑的。”<sup>[4]</sup>生态整体观理论上预设的中心是“系统整体”,实践上则是排除人参与的“生态中心”,与理论预设宣称的有出入。在建构生态整体主义观时虽然意识到了会出现问题,“强调生态整体主义要防止走向轻视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的极端”<sup>[5]</sup>导言,在具体的生态批评实践中却未能如愿。

在生态批评实践中,王诺生态整体主义“将这些动物放到整个生态系统中,去审视其对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重要性,进而决定人类对它们的态度”<sup>[5]165</sup>。他在对《沙漠独居者》解读时认为,“如果人遵循自然规律而杀掉动物不仅‘不意味着不尊重生命’,反而是‘尊重了那个生态系统’。”<sup>[5]165</sup>并且指出,“这种奋斗求生又不能打乱生态系统的平衡,而且还应当坦然面对大自然为我们设下的限度,纵使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是自然的辩证法、生态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态整体主义的生死观。”<sup>[5]171</sup>这只是一种生物系统意义上针对生物链而言的生态整体观,排斥人的参与,只是强调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因此,才有王诺先生对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的批判,认为小说的主旨是人以战胜自然伟力的方式来实现自我。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方式,在西方传统美学中存在着艺术美与自然美的区分,艺术美是主体对客体的美感直观显现,这种显现是不含功利性的,观赏一朵花不是想着这朵花可以作为饲料,但是在牛羊的眼中和人类的眼中花的处境不同。自然环境中山水存在维持了一个生态系统的稳定,这个系统本身的功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自然美对于人而言成为美,前提是没有利害关系,否则海啸、地震、泥石流就不是自然灾害,而是美的存在。归根结底,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方式是在动态平衡中以静态直观的,非功利性的方式呈现。而生态美学把生态学自然联系到美学,以形式美学之外的

标准——是否符合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来要求审美,其实是对传统审美方式的一种僭越。

这种美的僭越以生态视角判定符合生态系统原则的就是审美,以生态科学主义来僭越审美生活,其实这已经不是审美的标准。生态美学与传统美学的鸿沟是生态美学强调生态学意义上生态中心,生态系统的平衡以生态为优先原则,审美活动则是以人的主体性愉悦为优先原则。以这种生态学的整体主义观念去指导具体文学批评,只能产生强制性阐释,生态批评中需要坚持生态学意义上整体主义,也需要兼顾审美活动中人的主体性原则。西方哲学认识论其实就是要把生态学和美学联结起来,因此生态批评的跨学科属性是与生俱来的,人的参与“以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和人同本身的和解的崇高理想,昭示了一种具有鲜明的生态文明性质的存在方式”<sup>[6]</sup>。人的参与并不会否定生态整体主义,生态审美最终的实践还是需要人,王诺生态批评实践中未能实现理论预设上生态学整体观与审美活动内在原则的契合。

第二,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理论的背景是西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批判。彻尔尔·格罗特费尔蒂说:“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sup>[7]</sup>所谓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其实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谴责人类滥用技术理性,如对自然的征服、改造、控制和利用。王诺对西方文明发展进行了回顾,之后提出了生态思想文化批判包括六个方面: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征服和控制自然的批判;欲望动力论的批判;唯发展主义的批判;科学至上观的批判;消费文化的批判<sup>[8]</sup>。生态整体主义观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生态批评则强调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在整体观念上的王诺生态批评立足于此。从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生态批评的理论资源主要是现代工业以来的工具理性批判,这种文化批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期出现的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内在的理论渊源,在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生态批评在具体实践中以“工具理性”批判为圭臬,就会造成现代科技生产力对自然对象的过度伤害,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消极方面的批判在整体上是合理的,但是以此否定现代技术与生产力的进步意义,就显得不合理、不科学。

因此,生态批评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西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式的,就会造成批评上的偏差。在生态批评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西文化有不同的表达: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与自然和谐相处,遵循人与自然合一的逻辑,早在远古时代,中国人就建立了一种人类主体顺应自然的“天人合一”的关系。生态批评的具体实践领域需要审慎对待中西不同文化语境,不能因为现代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危机就全面否定其积极意义。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科学技术是作为我们改革开放实践的主要内驱力,是“第一生产力”。在中国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进程中,工具理性是否造了生态环境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严重失衡,都是值得追问的问题。同样在文学作品批评实践中,我们也要重新考量人与自然的关系。

总之,在生态美学思想的理论预设上,王诺先生描绘的生态整体主义实质是生态中心主义的。这种生态整体论虽然在理论预设上不排斥人,实际上却是有取消人主动参与的危险<sup>[5]139</sup>。生态整体发展自然包括人的发展,其实就是为了人,因此国外学者还是倾向于环境美学,并且强调环境伦理,注重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没有绝对把生态整体主义这个概念限制在自然生态系统的维度上。“生态圈的利益必须凌驾于个别物种的利益至上”,“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的有机体都是一个更大的生物网或网络或共同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的利益必须限制、引导和控制人类的利益”<sup>[5]140</sup>。其实就是把人类社会看作自然生态系统的的一个子系统,并非否定人的主体性参与。而在生态批评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又需要注意中西不同的文化语境,还要区别看待中国古代和现代不同的文化表征。我们需要基于具体的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否则就会陷入生态批评实践上的“强制阐释”困境。

## 二、生态批评实践困境

王诺生态批评把西方生态整体主义概念的直接拿来,在生态批评实践中坚持生态整体论却始终不能真正做到自圆其说。西方生态思想家和批评家把生态整体主义称为“生态中心主义”是不准确的,强调生态整体主义的前提是“去中心化”,“整体及其内部联系的强调,绝不把整体内

部的任何一个部分看作整体的中心”<sup>[5]139</sup>。这种整体论思想,是一次“哥白尼式”的从二元论到整体论的革命,不同于以往传统的审美观,“坚信世界不是环绕我们的环境而是一个整体”<sup>[5]141</sup>。国外学者把这种生态整体主义等同于生态中心主义,王诺在生态思想上虽然有对二者的区分意识,可在生态批评的具体实践中实际还是坚持生态中心主义,机械认定生态整体目的是为了人,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整体论中需要人的参与,但是也不能因为一旦有了人的参与,就不是生态的,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批评实践中产生的理论困境是,按照生态美学生态整体观的预设,生态美学批评实践绝不应该把整体内部的任何一个部分看作整体的中心。试以王诺“意境”理论阐释为例说明。

王诺从其生态批评的交融性原则出发来解读杜甫的诗句。“生态审美不是站在高处远远地观望,而是全身心地投入自然,有时候、特别是在审美初期,甚至需要忘掉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体。”<sup>[4]</sup>并认为那种天人合一,物我交融,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与物化矣的无我之境,就是一种生态审美。而王国维所谓有我之境,“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有我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因此就不是生态审美。但是杜甫的这句诗恰恰是全身心投入的,虽然有我,却与自然融为一体,却是情景交融的句子。情与景,意与境交融一体,主客不分,浑然一体。显然王诺先生把“忘我”,理解成了非人类中心,“有我”就是人类中心。这里就是涉及自然生态审美的观念具体指涉,在自然生态审美观念中符合生态系统整体原则的美才是生态美。然而这个自然生态审美还是需要人参与的,不能有人参与就认为是人类中心。生态美应该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产物,“是人与大自然的生命和弦,而并非自然的独奏曲”<sup>[9]119</sup>。而杜甫的自然环境描写就是因为“暂离网罟之祸”,是“忧生”之感,国破之痛,又触发其心志,这种生态审美观念自然不同于西方征服欲望,而是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是“一种与自然万物交往和谐相处的态度”<sup>[10]264</sup>。王诺认为,“较之传统的审美,生态审美突出的是自然审美对象,而不是突出审美者……生态审美旨在具体地感受和表现自然的美,生态审美是活生生的感受过程。”<sup>[4]</sup>生态审美是旨在表现自然本身,而不是“表现人对自然的抽象性认识不是表现人的思想……他们觉得那些描

写的重要性不在于那些自然物本身,而在于它们在概念上意味着或者能够被赋予什么,他们只重视那些自然表现的形式或象征或意识形态性质”<sup>[4]</sup>。显然这段话认为在自然之外引发人类情感而表现出来的那种美,只是人类借用自然工具达成的,只是重视自然的表现形式和象征。于是对于杜甫就有了这样的描述:“《春望》所描写的自然景物都只是抒情的工具,许多意境的重点不是‘境’而是‘意’。‘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里的花和鸟,对诗人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很有效、很形象地表达了杜甫的内心情感。综观《春望》全诗,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首诗的景观描写是人类中心主义式的,这首诗的自然审美不是生态审美。”<sup>[4]</sup>王诺把生态审美理解成只是单一表现自然审美对象,而忽视审美者与自然审美对象的联系。认为自然只是人表现自我的工具,完全割裂自然生态审美中审美者与自然审美对象的统一。把杜甫在《春望》中情感说成是人类中心主义式的,这里描写的自然审美也不是生态审美,我们不能认同这种判断。

王诺所认为的这首诗的自然审美,并不是他定义的生态审美,乃是基于生态批评审美原则中的自然性原则,在审美活动中把自然当做审美效果达成的一种工具。计成在《园冶》中这样写道:“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愈非匠作可为,亦非主人所能自主者。……体宜因借,匪得其人。”<sup>[11]64</sup>他非常明确指出,园林造景非人为可谓,讲究乃是人与景的融合,怎么能称作是把景当做工具来表现人呢?“情在景中,景在情中”就是意与境界的结合,如姜夔所言“意中有景,景中有意”,是“意与景融,辞与意会”<sup>[12]298-299</sup>。孤立任何一个都不能形成意象,情景是统一的,不能拆开说。意境理论中主体面对客体时,主体是由眼、耳、鼻、舌、身、意构成,是为六根;客体是由色、声、臭、味、触、法构成,是为六识,以六根面对六识,产生境界。“一方面用主体的眼、耳、鼻、舌、身、意给客观之景划定了一个界围,让这一界围之中景物成为主体感受中的景物……客体的色、声、臭、味、触、法,已经不是纯客观的,而是在主体的感受之中,主体的眼、耳、鼻、舌、身、意,也不是纯主观的,而是包含了所感受的客体。”<sup>[1]64</sup>意境理论中的情不是孤立的,不是与外在感官相区分的内在感官,而是知情意合一;客体也不只是事物的形象,而是形象内在的功利性法则与科学性法则和

主体内在的“意”在主客合一的“境”中存在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移情写照不是让审美者与天地的整体拉来距离、孤立起来,不是让境不同于景而成为孤立的绝缘的审美客体,而是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景的深化,是主体与客体在自然生态中的双向深化。

总之,生态美学的根本矛盾就在于,一旦按照人的主体性参与作为自然生态审美判断的唯一标准,艺术美学的审美原则和生态审美原则就是根本对立的。艺术美学要求乃是功利性纯粹的美感经验,人是作为审美主体性参与者存在,如果一个自然环境生态系统对人而言是有害的,威胁到人的这种美感也不会是被认为是美的。坚持生态审美就不能损害人的审美主体性参与,取消了人的主体性参与的自然生态审美只能剩下自然独唱,没有人的生态系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这种观点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那么这一点就是审美活动的底线,它是不能被完全彻底清除的。“环境—景观—生态美学与传统美学的差别,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孤立型认识(把美与其他方面区别开来)和关联型认识(把美和其他方面联系起来)的区别,也可以说是元素型认知(把事物分成元素,通过元素的认识来认识此物)和系统型认知(把事物看成是在系统中的物,通过认识系统来认识该事物)的区别。”<sup>[1]61</sup>所谓关联系统就是把其他事物和生态结合起来符合生态系统原则的就是美的,否则就是不是美的。生态美学作为一种关联型认知其有效阐释的范围是受到局限的。中国美学的理论与之有契合之处,但依然存在很大不同。

王诺生态批评在实践上产生了问题,主要是因为中西美学本质上属于两种不同的美学体系。“生态系统具有两个层面,一是具体时空中的生态系统,可以由当前生态学知识来予以把握,以目前人类的认识能力为限,是一个有限的生态系统,可以称之为小全知识;二是与具体时空中的生态系统紧密相连的整个地球乃至整个宇宙生态系统,可以称之为大全知识。”<sup>[1]62</sup>中国美学基本是和大全知识理论契合,是大全美学。大全美学审美感知基于大全认识,这种认识是人类尚未认识到也不可能以一种科学的方式去认识的,呈现出一种“空无”,而“小全”的生态系统又是由“大全”生态系统所决定。“由于虚实相生是中国宇宙的结构,因此中国人的审美一定是从实而体悟

到虚,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的美感。”<sup>[1]63</sup> 王诺把西方生态学中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念运用到中国古典诗歌的批评,属于小全知识中小全美学认识,小全美学运用小全生态系统知识,大力反对艺术美学的形式美模式,以建立新的生态型审美感知模式。这种小全美学的内在精神还是西方古典型的科学主义哲学认识美感模式,在心与物、主与客之间探求审美感知。因此,王诺生态批评实践面临困境也就自然可以理解。

### 三、生态批评困境的克服与生态美学的出路

王诺先生生态批评的“强制阐释”的主要问题就是在于不能把握人的生态位,即不能彻底贯彻生态整体论思想,使得在局部与整体论述中出现逻辑矛盾。克服这个问题,就需要彻底反思生态美学能否成立这一原则性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就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

第一,学术界对生态美学的争论一直围绕在人与自然、生态观与人文观、审美观如何能够统一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生态美学能否成立的原则性问题<sup>[13]</sup>。因此,克服生态批评的“强制阐释”,必须要面对这一原则性问题。自然生态审美不同于自然美,也不同于以往的主客二分传统的审美,需要人的参与。生态批评的审美标准不应当只考虑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而要结合人的审美主体性参与。不能把人的主体性参与等同于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认为是生态人文主义。自然生态审美是要凸显自然系统的价值,而非仅仅以人为参照的审美;但是同样也并非不需要人的主体性参与,而是需要人的参与并且要与自然融合,达到一种中和之美,整体生态之美。

王诺的生态批评之所以饱受质疑,就是因为虽然坚持生态整体主义,但依旧使人与生态完全对立;虽然强调人的参与,强调生态整体,但是始终在批评实践中未能践行,且出现前后矛盾的论述。在生态整体论的贯彻中,面临无法正确摆放人的位置的困境,王诺先生因此把人的生态位、人本主义称为“小尾巴”。他坦然而真诚地指出,“在论述人直面自然物(比如野兽或者病菌)潜在的生命威胁时,没有完全站在生态整体的立场上。”<sup>[5]281</sup>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缺口的存在,才使得王诺在整体论述中显得不周全,也让他在生态批评实践中不能一以贯之其生态主张,造成“主

张局部的个别观点与核心观点产生了矛盾”<sup>[5]281</sup>。

第二,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生态智慧的汲取。生态整体论审美观的建构,不单单是要汲取西方的理论资源,同样也应汲取东方智慧。在东方智慧的审美生活中,“世界的整体性,几乎就是一种先天自明的预设”<sup>[14]67</sup>。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被外来话语遮蔽。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注重天人相和、万物相生。人与自然生物是相亲合一,所以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杜甫有言“山鸟山花吾友于”。更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人以动物做属相,并且有属相如人的说法。这些观念无不表明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因天人的和谐才能想象与万物化生。生肖文化“实际上已经构成中国人的生态空间”,然而这样的生态智慧却一直被认为不可登大雅之堂<sup>[10]57-73</sup>。

以儒家为例,孟子具体提出了与民养生、有限制地利用自然的主张。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sup>[15]189</sup> 按照自然的规律,并且根据资源的可承载能力来获取资源,这种思想可谓是超前的。自然生态审美讲究的乃是天人合一,是一种整体的和谐美。“中国传统的审美方式,历来不局限在对象的感性形式本身,不过分苛求形式的精致,不满足于单纯的感官快适,而直指内在的生命灌注,追求对象与心灵的契合,进而达到生命本质的浑然为一,即所谓的出神入化,进入化境。”<sup>[16]13</sup> 这种自然和谐的审美观念,就是潜藏在中国传统生态智慧里的,只是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西方生态批评话语所遮蔽,不能凸显其价值。对于中国古代优秀的生态思想我们需要重视起来。

第三,构建中西结合的文化视域,汇通中西生态哲学智慧。中西汇通的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典型的代表是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存在论哲学观是“此在与世界”在世的模式,人与万物共生,共同构成世界。但“此在”的人具有领会和阐释万物之意义与价值的功能<sup>[16]13</sup>。道家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sup>[17]169</sup> 显然,人在道家看来也是居住者之一。这是海德格尔思想与道家思想的中西汇通。西方美学哲学科学主义的思维是一种非时间性的统一、齐一、规则化的思维方式,要么是绝对的主观要么是绝对的客观,绝对主观发展到最后就必然

形成灵魂之说的宗教信仰,而绝对客观发展必然产生实验为主的科学。而中国美学的美感经验却是在主客之间,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时空”中展开,园林美学的审美讲究一步一景,移步换景,如果按照景观美学和生态美学的标准,这样的生态改造为了人的审美而干预了自然,显然不是生态审美。在审美“时空”语境中,当今生态美学的危机其实也是空间美感主体的缺席<sup>[18]</sup>,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加强中西交流,融汇中西生态哲学之精华。

第四,应该说当今生态学并不否定人类物质生产力包括现代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提升人类物质生产力。生态学所反对的是当代的人类技术系统对自然的过度改造、开发、滥用造成的生态破坏,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生态学没有抽象否定人类生产力的历史发展,而仅仅是纠正生产力中的某种偏差。生态美学因此过度否定人的主体性参与到审美活动显然是一种矫枉过正。人类生存与自然界之间是一种内在关联的共同体关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主体自身和自然界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关系的观点显然是有问题的<sup>[19]</sup><sup>475</sup>。批评科学技术对自然的伤害以及过度经济增长对生态平衡的破坏本身并没错,然而,当把这种理论思考转变为对审美活动中人的主体性参与的根本否定,否定人类审美过程中自然给予人的审美愉悦,显然已经违反了审美理论的逻辑自洽。因此,走出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的逻辑困境需要我们警惕西方生态学对审美活动的僭越,自然生态审美活动需要人的主体性参与构建,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是平等的,在生态位格上双方是对等的。

综上所述,站在生态学立场来看,科学技术的确给自然带来了破坏,这种反思让我们警惕人类中心主义。可是,生态学是一门自然学科,迁移至审美活动中,不能因此迁怒于人的主体性,取消人类中心,让位于生态中心,从而取消审美活动中人的参与。生态整体主义的原则是强调生态整体论,在自然生态审美中强调生态整体就容易变成强调生态中心,势必导致忽视人的主体性参与,最终形成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的两种观点。克服生态批评的“强制阐释”,我们需要在

自然生态审美中坚持人的主体性。审美的底线是人的主体性参与,离开人的主体性参与,奢谈生态系统整体上的利益,还只能是停留在生态中心主义立场。生态整体主义所宣扬的人作为一个生态位格,与生态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在其求诸生态价值时已悄然放弃了人的坚持。把科学主义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过度发展,其实有些矫枉过正,违反了适度原则,过犹不及。科学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根本还是在于以绝对客观的思维来看待世界,生态美学尤其需要在这主客不分的领域内寻找答案。走出生态美学的理论困境,我们需要把视野投向到东方,只有认识到中西美学属于不同类型的美学形态,在生态批评实践中才能避免“场外”理论对本土知识的“强制阐释”。

### 参考文献:

- [1]张法. 美学重要问题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2]高柏园. 论荀子的环境思想——兼论环境伦理学[C]//周宁,盛嘉. 人文国际(第5辑):生态文学专辑.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 [3]王诺. “生态的”还是“环境的”?——生态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J]. 鄱阳湖学刊,2009(1).
- [4]王诺. 生态批评的美学原则[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2).
- [5]王诺. 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6]曾永成. 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7]王诺. 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J]. 文艺研究,2002(3).
- [8]王诺. 生态批评的思想文化批判[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4).
- [9]徐恒醇. 生态美学[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 [10]张皓. 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M].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
- [11]计成. 园冶[M]. 北京:城市建设出版社,1957.
- [12]叶朗. 中国美学史大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13]曾繁仁. 生态美学建设的反思与未来发展[J].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0(1).
- [14]鲁枢元. 生态批评的空间[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15]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6]朱志荣. 中国艺术哲学[M]. 长春:东北师范大

学出版社,1997.

[17]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8]刘彦顺.论“生态美学”的“身体”、“空间感”与“时间性”[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3).

[19]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似自然性、物役性批判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On the Predicament and Outlet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Eco-criticism: Starting from Wang Nuo's Eco-criticism

LI ZHongch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reason why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eco-criticism are facing difficulties today is that the reflection of western ecology on the evil consequences of human beings' excessiv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is regarded as the standard of aesthetic activity criticism, and ecology arrogates aesthetics, which results in the antagonism between the artificial natural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human beings. The ecological crisis caused by the “science—tool” doctrine prompts people to criticize the anthropocentrism and call for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cosystem. As the main body, people participate in aesthetic activities, which is the bottom line that cannot be cancelled in aesthetic activities. While adhering to the naturalness and ecology of natural ecological aesthetics, we cannot completely exclude people's subjective participation. Therefore, to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eco-criticism, we need to hav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subjectivity in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t “spatio—temporal” context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esthetics in the transfer of theorie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avoid “forced interpretation” in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eco-criticism, which is also the outlet for the future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Key words:** ecological aesthetics; eco-criticism; subject and object; subjectivity; Chinese aesthetics  
(责任编辑 梅 孜)